

# 南部非洲的街头青年

彭佩拉尼·穆福恩

## 引言

街头青年是个全球性现象。非洲一般通用“街头青年”或“街上的孩子”，而欧洲、北美和澳大利亚则用“无家可归者”或“离家出走者”称呼街头青年。自 1970 年代以来，南部非洲街头青年的人数就不断增加，现在已成为城市地区的普遍现象。他们许多人居无定所，又害怕当局，准确估测他们的人数于是就成了件难事。街头青年是些什么人？研究他们会遇到些什么问题？他们有些什么特点？南部非洲的街头青年与世界其他地方的有什么不一样？社会应对街头青年负什么责任？本文探讨这类问题，以便系统阐述社会科学家为我们了解南部非洲的街头青年都做了哪些工作。笔者指出了界定和研究街头青年的问题和分歧所在。制定和调整针对街头青年的政策和计划，需要先了解他们。

## 青年与街头孩子 青年的定义

要对青年这一概念进行界定并不容

易。通常将童年与成年之间的阶段称做青年，但不同的社会有各种角色、社会变迁，有其特定的复杂性，因而对青年的具体起止时间有不同规定。因此赫里尔曼 (Hurrelman, 1989) 指出，对青年最好的定义不应有固定的年龄限制。它是生命中一个独

立的阶段，其经历是某个社会中文化的产物。个人成长与社会定位都需要经过这样一个阶段。

南部非洲大多数国家在规定年龄界限时遵循联合国组织及共同体秘书处的定义，将 15 岁至 24 岁定为青年期。但也有个别国家略有不同，例如博茨瓦纳和赞比亚将 30 岁以内的人归入青年，斯威士兰甚至包括 35 岁的人。而另一些国家则把 12 岁算做青年的起

彭佩拉尼·穆福恩是纳米比亚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和主任，研究青年问题长达十多年，论著包括《博茨瓦纳、斯威士兰、赞比亚等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国家的青年计划》，发表于 1994 年《国际社会工作》第 37 卷第 239—263 页；《南部非洲的青年与发展：社会科学的成就与挑战》，发表于 1999 年《南部非洲发展》第 16 卷 (2) 第 357—369 页。通讯处：Pempelani Mufune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University of Namibia, Private Bag 13301, Windhoek, Namibia E-mail: pmufune@mail.unam.na

点。  
不管各国采取哪种定义，目前在南部非洲国家的人民以青年居多。这一地区的人口金字塔都是底大顶小。底大说明出生率高，人口集中于较低年龄组；顶小则说明死亡率高，平均预期寿命短。

人们通常认为青年是为成年生活做准备的时期。从学校向工作的过渡，这几乎

是所有国家的主要问题。许多地方有一份工作才算进入成年状态。然而南部非洲的学校和就业系统严重短缺。尽管各国在改善正规教育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但仍无法满足急速增长的学龄人口的需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教育报告》(UNESCO,1998)指出,南部非洲的净入学率很低。净入学率指达到政府规定的某一教育阶段就学年龄人群的入学率。博茨瓦纳的中学净入学率为45%(男性42%,女性48%),赞比亚为16%(男性19%,女性14%),莫桑比克仅为6%(男性7%,女性5%)。赞比亚只有25%的小毕业生升入中学。接受第三级教育的人数就更少了。女性受教育的情况比男性更差。由于实行结构调整计划、受教育的机会短缺,加之全球化对劳动市场的冲击,南部非洲的失业率也很高。许多青年找不到工作,雇人时他们排最后(许多人没有职业所要求的教育资格),解雇时他们排最前(没有工作经验)。青年人的失业率是年长工作者的2倍至10倍。纳米比亚的总失业率为34.8%,而15岁至19岁人的失业率高达61.7%,20岁至24岁年龄组为54%,30岁至34岁年龄组为31%,45岁至49岁年龄组为19.8%(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Namibia,1998)。青年人缺少受教育和就业机会引发的后果决不可低估。教育和就业无法成为青年人社会流动的渠道。这两个因素是造成街头青年现象的重要原因。

街头青年是一群特殊青年,其年龄大致在5岁到20岁之间。勒·卢和史密斯(Le Roux and Smith,1998a)用这个词统称那些泡在街头的青年,他们的其他特征则或同或异。街头青年是个多样的群体,他们有的上学,有的和当局有过节,有男孩,也有女孩。对街头青年的各种定义中有三

点是基本相同的:久呆在街头,街头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没有从照管他们的成年人那里得到足够的保护、监督和/或照顾。南部非洲的许多街头青年参与公共领域中合法或不合法的经济活动。街头则指公共汽车站、店铺门口、城镇的大街小巷、停车场,以及诸如此类的公共场所,这些是他们讨生活的地方。安纽(Annew,1996)由此认为街道在不同语境中有不同的含义。对于某些人它是社会化的场所,而对于另一些人却不过是往来通行之处。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认为,对流落街头的青年人,应视其与照管他们、为他们提供住所的成年人的关系而分门别类(Annew,1996;Le Roux and Smith,1998a)。他们将街头青年分为“街上的青年”(youth on the street)、“街头流浪青年”(youth of the street)和“被遗弃青年”。街上青年指那些参与经济活动的青年,如乞讨、替购物者拎包、擦车以及贩卖小商品。他们在街上干活,非常显眼。他们据说有家可归,并且向家里交钱,在某个家庭或家户里有归属感,甚至可能在某个学校读书。街头流浪青年则离家更远。他们与家户或家庭的关系断断续续,即使有也非常淡漠。许多人想要离开家或者监护他们的成年人,到外面生活。街头成为他们天地的一个重要支点。安纽(Annew,1996)指出,街头青年中的一小部分人进一步被分为被遗弃青年。这些青年与亲属很少或根本没有联系,也不想受家里成年人的监护。他们完全在街头生存,与传统社会脱离了关系,他们无意离开街头,以至自认了一个“街头身分”。但安纽(Annew,1996)反对这种划分,认为对街头青年的这种操作性定义,是从拉美计划工作者的观察中得出的分类法。

这种划分肯定不符合非洲的情况。非洲在语言和文化上比拉美更多样。把上述

街头青年的概念用在非洲,近乎将另一种环境中的观念,把文化单一性强加于非洲。阿普特克和阿贝伯 (Apteker and Abebe, 1997) 也指出,街上青年与街头流浪青年这样的两分法容易引起误解,因为这两个群体并非很不一样,没有人格特征上的差别。有些青年在两者之间变换不定:一段时间住在街上,和家人很少或者根本不联系,过一段时间又回家了。南部非洲大部分街头青年参与公共场所的经济活动。有证据表明,非洲的街头青年算是街上青年还是街头流浪青年,要依他们的具体处境而定 (Apteker and Abebe, 1997)。例如战争难民可能成为街头流浪青年,可境况一旦得到改善,他们就不再露宿街头了。

上述街头青年的定义还可能预设一种脱离现实的关于童年和家庭生活的概念。非洲的中产阶级普遍有一种强烈的看法,认为年轻人都该有个家,因为持续而稳定的社会秩序,其核心就是家庭。他们认为成年人(父母)对青年人负有重大责任。他们尤其认为男性(父亲)应该到外面找份工作,养家糊口;女性则留在家里,做照料孩子之类的事情。孩子则多少仅仅被动地接受大人的照料和期望。这种家庭可能对妇女形成剥削,而让男子承担过多的压力。有些研究者认为这种家庭在现实中从来不曾存在。莫桑比克的人类学研究表明,孩子为家庭做贡献从来积极而有韧劲。有人把孩子比做香蕉树。几年之后便不再需要荫庇,经历过火烧仍能发出新芽。年轻人似乎能在工作中获得自尊。

## 研究南部非洲街头青年所遇到的问题

唐纳德和斯沃特-克鲁格 (Donald and Swart - Kruger, 1994) 指出,关于街头

青年的可靠资料在南部非洲很难搜集,原因在于他们过着一种隐蔽、流动、不可预测的生活。大多数研究靠的是对街头青年进行访问,所依据的仅仅是自述,而自述是不可靠的。科伯恩 (Cockburn, 1991) 认为,“街上的活”需要见机行事,并且要靠一定程度的隐蔽和欺骗。“向别人谈论自己时,他们得有牵着听众鼻子走的能力,这是他们的一种生存技巧” (Apteker, 1994, p. 199)。想让公众掏钱出来,这种技巧是必不可少的。想在充满敌意的成年人统治的环境里活下去,也需要这些技巧。因此,他们自报家门时提到的年龄、遭遇和家庭情况(包括亲属关系),自然不怎么可靠。这一问题可以靠收集纵向历时资料,或参与观察的方法得以解决。可惜许多调查都是横向的。

任何社会调查都必须考虑抽样的问题,以达到实证研究的有效性。可是非洲许多国家却没有合适的抽样框架。具体到对街头青年的研究,由于疑虑过多,根本就不可能建立任何框架。另一个原因是街头青年居无定所,很难长期追踪。这也就是说,街头青年研究大多只能采用非概率样本,如关系网(雪球)样本。普通的调查总是假设从中抽样的人口是无限的。然而关系网抽样却不能做这样的假设,也无法将被调查人口分层或随机化。可是研究街头青年的人大多数把雪球样本当做普通样本使用。

## 南部非洲街头青年的画像

街头青年的多样性不仅见于他们从事的活动和对他们进行分类的方式,还表现在这一现象因国家因文化而异。所有的研究报告都说街头青年多为男性。斯威士兰的街头男孩多于女孩 (Maphalala, 1996)。

津巴布韦的哈拉雷很少见到女孩子在街头游荡 (Dube et al. ,1996)。博茨瓦纳的街头青年 90% 是男孩 (Campbell and Ntsabane ,1997)。塔肯 (Tacon ,1991) 的调查则显示在纳米比亚 ,街上的孩子中男性占 80.6%。赞比亚的一部分研究发现 ,街头青年中男性多达 90% ,而另一些研究则给出了不同的数字 ,不同的城镇男孩所占比例从 63% 到 78% 不等 (Phiri ,1996)。街头青年中男性居多 ,一部分原因在于女子得留在家里干活 ,比如看孩子做家务 (Rose - Junius ,1993) ;“连穷人也不敢把自家女儿放到街上去” (Dube et al. ,1996 ,p. 260)。杜布等人 (Dube et al. ,1996) 发现许多人之所以愿意给女孩子提供一个安身之处 (她们就不用流浪街头了) ,是因为在她们身上有利可图。

流浪在街头的人中有青年也有儿童。有些孩子年仅 5 岁就在街上干活 ,有的则已是 20 岁出头了。由于长期营养不良 ,他们通常比实际年龄显得小一些 (Le Roux and Smith ,1998a)。菲立 (Phiri ,1996) 的调查发现 ,赞比亚街头上大多数孩子的年龄在 8 岁至 14 岁之间。塔肯在纳米比亚看到的多为 5 岁至 24 岁。杜布等人 (Dube et al. ,1996) 发现津巴布韦的街头青年年龄为 12 岁至 20 岁出头。斯威士兰的数字则为 7 岁至 20 岁 ,但 13 岁至 15 岁的人最多 (Maphalala ,1996)。年龄较大的青年不再流浪街头 ,因为他们无法以此为生。“街上的活”无非是让大家解囊 ,办法自有多种 :做悲惨状 ,讲苦难遭遇 ,做个样子 ,既表明自己的不幸 ,还能让别人动心。这些事情年纪小一些的人做得像模像样 ,年龄大了再做 ,就算不被当成罪犯 ,至少也是坏了公共场所的规矩。

街头青年绝大多数有个安身之所 ,上街只是为了挣钱。其中许多人来自社会经

济底层 ,饱受贫穷之苦。牟齐尼和年迪亚 - 邦迪 (Muchini and Nyandiya - Bundy ,1991) 在津巴布韦的调查表明 ,85% 的街头青年至少有时与家人生活在一起。大约 58% 的街头青年父母失业。坎贝尔和恩萨巴恩 (Campbell and Ntsabane ,1997) 发现 ,博茨瓦纳只有 7.6% 的男孩露宿街头。斯威士兰的研究也表明样本中的青年只有 28% 睡在街上或以街为家 (Maphalala ,1996)。斯威士兰几乎 67% 的青年说他们是由于经济困难才到街上去混。唐纳德和斯沃特 - 克鲁格 (Donald and Swart - Kruger ,1994) 在南非的研究表明 ,到街上找活干的青年 90% 晚上各自回家。塔肯 (Tacon ,1991) 调查了纳米比亚城镇的街头青年 ,发现其中大多数人还是有家可归的 ,在街上露宿的人只占 2% ,其中大部分出自自由女子当家的家庭 ,家里穷 ,人口又多 (每户平均 10 人)。塔肯认为 ,这种构成使这些家庭比“普通核心家庭”在经济上更容易遭受不测。除了年纪最小的 ,家里人人都得出去工作 ,这样才能活下去。这些家庭里的年轻人大多在街上讨生活 ,他们挣得的钱大部分用来为自己和家人糊口。塔肯和伦万迦 (Tacon and Lungwangwa ,1991) 在他们的报告中指出 ,赞比亚 41% 的街头孩子挣了钱交给自己的父母或监护人 (再次表明他们与家庭的联系)。

塔肯在纳米比亚和赞比亚 ,以及科伯恩 (Cockburn ,1991) 在南非的研究都表明 ,街头青年常出自单亲或女子当家的家庭 ,甚至虐待性家庭 ,但这种结论并不可靠。这些研究都没有用对照组 ,研究者便无法断定人们是由于这些原因 ,还是因为社会环境中的其他特征才沦落街头的。还有一种说法 ,认为青年流落街头是父母或继父继母的过错。这种说法同样不可靠。实际上在南部非洲做的研究只注意了街头青

年,却很少研究他们的家庭。坎贝尔和恩萨巴恩在研究中使用了对照组,结果发现街头青年的家庭环境与低收入家庭的非街头青年没有显著差异。

不同国家之间倒是存在差异。在纳米比亚和南非,种族是个重要因素。绝大多数街头青年是黑人。倒不是说白人青年就没有境况不好的,但政府一直(或曾经)对他们另眼相看。“南非街上的孩子几乎没有白人,但有1万名白人孩子住在国家开办的或受国家补贴的儿童收容院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国家在城市地区没有为黑人孩子开办一家收容院。”(Ross, 1991, p. 70)。都市化越高的国家街头青年越多。不同国家街头青年遭受的暴力程度也不尽相同。

## 街头青年现象的起因

对于引发南部非洲街头青年人数增加的一些原因,研究者似乎看法一致。这一节我撮要谈谈几个主要原因。

### 调整经济结构

1970年代,南部非洲国家遭遇经济困难,于是开始调整社会和经济结构。到1980年代,赞比亚、坦桑尼亚、马拉维等国进入了漫长的经济危机时期,津巴布韦和莱索托紧随其后。饱经战乱的安哥拉和莫桑比克也未能幸免。除了博茨瓦纳、纳米比亚和南非,这些国家都被迫接受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行的结构调整计划(SAP)。结构调整计划推行的是新自由主义国家体制,依靠市场配置资源和财富,国家的角色被削弱了。这种调整使人们获得更大的利润,使工会丧失了以往的价值,使国家经济更多地纳入全球市场。社会福利也受到这些经济政策的深远影

响,结果之一就是削减健康、教育和食品补贴。贫困使穷苦人家不得不让青年人出去工作或者自谋生路(也就是流落街头)。大多数青年是被贫困逼到街上去的(Apteker, 1994)。混在街头是对贫困无助的一种公开表述,是向公众和相关的个人宣布“我很穷”。

### 家庭结构的变化

现代化因素导致了家庭结构的变化(增加了家庭不和)。所谓现代化,是指社会向城市化变迁的过程,也是国家利用先进的工业技术并获得发展的过程。此外,尽管人们仍在争论不休,现代化过程还与新自由主义政策、核心家庭制度以及其他据说是西方文化特征的引进相关。街头青年的增加,反映了人们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社会压力而经历的各种问题(Le Roux and Smith, 1998a)。

人们已经看到,现代化带来的新价值和新的社会控制形式与传统价值和传统社会控制形式并存。受现代化影响尤深的社会制度有三种:家庭结构、对教育的期待和行政管理体制。有人认为家庭在生产和社会化中的作用将逐渐消失。传统的家庭向外延伸成一个关系网,把直系亲属(核心家庭)以外的亲戚联在一起。它超越了核心家庭,包括了非血缘的和数代以外的亲戚。传统家庭(有人认为它们仍以不同程度存在于南部非洲的乡村地区)是生产单位。许多家庭以“家田”为中心组织起来,男女老幼在“家田”上各做各的事情。父母、长辈和其他亲戚共同参与孩子的社会化。如果一个男人无力养活所有的孩子,他所在的扩大家庭会代他照料妻儿(Apteker, 1994)。这是亲属结构和传统的要求。亲生父母顾不过来(如离婚、少年母亲或没有经济能力)的孩子就送给亲戚,他们顾得过



纳米比亚奥沙卡蒂，一群孩子在废铜烂铁堆上玩耍。Chris Steele Parkins 摄影 Magnum 供稿。

来的孩子有时也送给亲戚。孩子不仅属于亲生父母,也属于整个扩大家庭。但是小孩很少送给非血缘亲戚。

现代化和工资劳动制度的实行改变了这一切。许多人,尤其是男子,受雇于家庭之外的时间越来越多,而且常常成为家里惟一的财政来源。社会在变化,核心家庭成为大趋势,亲戚之间收养孩子的事越来越少。家庭里产生了成就事业的愿望和更多的个人主义。组织社会关系时一般不再以亲戚关系为核心;长辈也不再控制全家人的经济状况了,他们在权利结构中不再占有优势。单亲父母越来越多。许多人从乡村向城市流动,由此摆脱了传统的束缚。人们纷纷甩掉对扩大家庭的各种责任,于是亲戚间横向和纵向的纽带都松散了。“儿童不再成长于社区氛围浓厚的扩大家庭”(Apteker,1994)。新式家庭养不起一大群孩子,也不能随时为远亲提供食宿。家庭越来越“核心”了。于是家庭一旦出现危机,又没有亲戚来收养孩子,这些孩子就可能沦落街头。一些年轻人受了现代化的影响,不愿服从父母的规矩和管教。这些孩子也有可能被赶出家门,流落街头。

## 艾滋病

艾滋病已经在南部非洲敲响了丧钟。越来越多感染了艾滋病的年轻人加入街头青年的行列。过去数年里,南部非洲成为艾滋病的主要流行区。人口中血清感染率在20%左右。联合国预防艾滋病联合计划的报告表明(UNAIDS,1998),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已有200万人死于艾滋病。生产力最强的年龄组(20岁至49岁)已经受到严重感染,存活者逐渐以老人和年幼孤儿为主。据联合国预防艾滋病联合计划的估计(UNAIDS,1998),津巴布韦2000年每天将有350人死于艾滋病。到2005

年,将有90万15岁以下孤儿,他们失去父母,只能独自挣扎。南部非洲其他国家的情况基本相同。20岁至49岁年龄段的患者和死亡者撒下很多孩子无人抚养。父母患病及最终死亡使得家庭失去收入来源,无法满足对住房、食品和衣物的基本需求。这种境况中的孩子许多不能上学。父母患病及最终死亡对孩子也是一种伤害,这些儿童和青年最易流落街头。

## 战争

战争是导致安哥拉和莫桑比克青年流落街头的一个因素。罗福尔特总结道,“我们遇上的街头青少年大多是,而且主要是,战争以及战争造成的国家政治、军事、经济和社会动荡的结果”(转引自Annew,1996,p.208)。许多年轻难民涌入大城市,只能在街头讨生活。

种族隔离政策是造成南非和纳米比亚街头青年的一个重要原因。对非白人来说,实施种族隔离意味着强制迁居、移民劳动制度和失业。这一制度在1970年代引发了年轻人的反抗和战争,导致了流浪的街头生活,以及街头青年涌入城市中心地带(Cockburn,1998,转引自Rose-Junius,1993,p.91)。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所有这些宏观层面上的因素,是街头青年现象的大背景,是一些必要条件,但不一定是充分条件。受这些因素(现代化、政治因素、贫困等)影响的青年不一定全部沦为街头青年。即使同一个家庭的孩子,有的流落街头,有的却没有。什么样的人容易流落街头,其中的因果很难截然分清,但我们解释这种现象时,必须考虑每个人参与及不参与的社会行为。阿普特克(Apteker,1994)认为有必要考察相关个人及家庭的心理状态、他们对街头生活的认识,以及特定文化对

街头生活的接受程度。当然,流落街头可能是由于祸不单行,各种麻烦(如家庭关系紧张、挨了父母的打、父母一方再婚、与本人关系重大者亡故以及饥饿等等)加在一起所致。每个年轻人沦落街头的原因都不尽相同,记住这一点非常重要。年轻人不会一夜之间突然变成街头青年。这种生涯似乎有不同的阶段,一个阶段不会自动发展为另一个阶段,而是由每个人的环境、性格以及别人对他/她的态度推动的。街头生涯刚开始时,年轻人并不清楚他在做什么。他可能感到害怕和迷惘,于是离家出走一两天,然后在街头的的时间越来越长(Apteker,1994)。如果经历非常不愉快,如果他找了份工作或得到亲戚朋友的帮助,街头生涯可能就此结束。到了第二阶段,街头青年往往在街头和家之间徘徊。这时街头已不那么陌生和恐怖。年轻人在这一阶段虽然与家庭保持着联系,但在街头的的时间越来越长,只有极少数青年堕落到完全抛弃家庭的程度。

## 街头青年问题

### 公众对街头青年的看法和反应

在南部非洲所做的研究表明,公众对街头青年没有好印象。新闻界把他们描绘成“坏男孩”。人们觉得马路上脏乱差都是他们的过错。有些街头青年缠着路人乞讨、擦鞋、看车,把形象弄得更糟糕了。有些街头青年受成年人利用,参与了一些人们认为不道德的活动,尽管另一些街头青年“在剥削和虐待面前表现得非常英勇”(Dube et al.,1996,p.264),却不能改变他们的整体形象。在公众眼里,街头青年不是活生生的个体,而是一个没有血肉的集合,因此对他们产生误解(Le Roux and

Smith,1998c)。

公众对街头青年的反感有时会化为暴力。威廉姆斯(Williams,1996)详细记录了在南部非洲发生的这类事件:南非的店主用沸水和生皮鞭驱赶街头青年;开车的人经过他们时用子弹向他们扫射;街头青年被放火烧死。拉贾尼和库德拉提说(引自Williams,1996),坦桑尼亚的街头青年最害怕的就是遭遇暴力。

警察对街头青年施暴并不稀罕,尽管比起拉丁美洲还略逊一筹。菲立(Phiri,1996)在其著作中提到,赞比亚的街头青年受到警察的骚扰,而且未经起诉就被关在警察局的牢房中达数天之久。津巴布韦的警察为了维护市容,经常性地收容街头青年(Dube et al.,1996)。南非警察的粗暴行为多得很:“拳打脚踢、使用催泪弹、把不会游泳的人扔进湖里、强迫他们喝酒吸胶烟再以醉酒为由痛打他们”(Le Roux and Smith,1998c,p.902)。

### 健康

罗斯-朱尼厄斯(Rose-Junius,1993)指出,人们关心街头青年的健康主要是由于以下三个原因。第一,他们在街头难免忍受夏炎冬寒,遭遇事故风险。第二,他们很难得到医疗服务,也无力支付服务费用。最后,他们根本不想利用现有的医疗设施,而且对这些设施一无所知。营养不良大约也是一个原因,但有些研究表明,街头青年吃得比他们那些与成年人同住的兄弟姐妹还好一点。杜布(Dube,1997)到医院查看了66名津巴布韦街头孩子6个疗程的资料,发现其中42%的人患有胸部和尿道感染,14.5%的人患性传染病(STDs),10.5%的人患皮肤病,9%的人因暴力致伤,另外9.2%的人患有耳、鼻、咽部感染。其他人也有无法确定的病痛。这些疾病大



多是由街头的不卫生状况引起的。

不管在什么地方,艾滋病感染总是青年人情况最严重,而街头青年尤甚。斯沃特-克鲁格和里克特(Swart-Kruger and Richter, 1996)认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街头青年抵抗力弱,开始性生活的年龄较早,而且性伙伴较多。街头青年受到性剥削,为了生存(或交易)进行性行为,并且很少用避孕套。他们比其他青年感染性疾病或怀孕的几率更高。街头青年对艾滋病的了解非常少。斯沃特-克鲁格和里克特(Swart-Kruger and Richter, 1996)在南非进行抽样调查,发现28%的受访者认为自己凭肉眼就能看出艾滋病病毒携带者。杜布(Dube, 1997)在津巴布韦做的调查同样证实了这一点,并发现那里的街头青年认为这种疾病可以通过传统方法治愈。

## 心理状况

许多迹象表明,街头青年心智正常。他们中的很多人是在理智的状态下做出了离家出走的决定。他们是一步一步地,而不是突然地做出这样的事情。他们知道公众和当局对他们没有好感,因此对陌生人怀有戒心。他们轻易不向研究者透露实情,以防研究者利用这些材料做对他们不利的事情。他们思想传统,热爱家庭,远离犯罪。他们最喜欢的工作是技工、电工和司机(Bar-on, 1997)。几乎所有研究都显示,他们珍惜自己的独立和自由。从津巴布韦的研究中,人们看到一部分街头青年挣的钱比家庭服务员和非熟练工人还多(Dube et al., 1996),可达成人平均最低工资的1倍至1.5倍(Bar-on, 1997)。

一些研究也反映出不好的一面:街头青年容易丧失时空感,漫无目的地四处游荡。研究者发现他们不大自尊、缺乏同情、听天由命。南非的情况是,在街头的时

越长,出现心理疾病症状和受外界控制的几率越大(Le Roux and Smith, 1998a)。

## 歪道

以社会的标准来看,街头青年可谓离经叛道(Le Roux and Smith, 1998b)。许多人将他们视为胡作非为之辈。这也不是没有根据。罗斯-朱尼厄斯(Rose-Junius, 1993)在研究中发现,纳米比亚街头青年从事的高收入活动是偷窃和卖淫。他们普遍吸胶烟、汽油,或诸如此类的东西,以逃避街头的现实(Le Roux and Smith, 1998a)。“街上的孩子有时无疑是暴力的导火索”(Williams, 1996, p. 227)。在吸胶烟、抽烟、喝酒这些方面,博茨瓦纳的街头男孩和其他男孩有显著差别(Campbell and Ntsabane, 1997)。街头本是非正式部门,有许多不合法的行为。但是街头青年走歪道不是件简单的事情。他们卷入暴力多半是出于自卫,他们的行为失当也并不比其他青年更过分。博茨瓦纳75%的街头青年犯罪记录是“清白”的(Bar-on, 1997);纳米比亚虽有28%的青年曾经受到拘捕,但80%的人都被释放了;而赞比亚从未有过街头青年被送上法庭的记录(Tacon, 1991)。

## 对街头青年现象的政策反应

对街头青年,南部非洲需要有明确的政策。原因有几重。首先,街头青年人数日增,当局认为有必要做出有组织的反应,以减少其人数。其次,当权者还需要“重新安置”街头青年,使之“重新纳入”更广泛的社会。人们对许多街头青年抱有固定的成见,视他们为罪犯,歧视他们。这种行为无形中损害了他们的基本人权。将保护街头

青年的权利作为一种道德责任,以及使之“重归社会”,都需要相应的政策。最后,街头青年现象反映出各国教育和就业体系的弊病,这些问题要靠政策解决。

针对街头青年的政策和计划包含着两对矛盾:强制与同情,正义与实际。第一对矛盾的一方是处理街头青年问题时的强制性,另一方是对他们的理解。第二对矛盾的一方是道德立场——年轻人不能流落街头,另一方是可行性。从这两对矛盾中产生了4种政策,它们并不互相排斥,而是在不同国家交错地使用。第一种政策是强力与实际刺激相结合,限制街头青年。赞比亚和津巴布韦将街头青年收容再释放,可作为一例。这些行为给街头青年打上了罪犯的印记。

二是惩罚街头青年以儆效尤。巴西等国刺杀街头青年,正是出于这种立场。南部非洲警察的粗暴行为亦属此类。惩罚损害了街头青年的权利,不是解决问题的长久之计。

三是通过教育和创收计划,使青年回归家庭和社会。例如纳米比亚在地方政府与住房部下开设了街头少年处。该处截止1992年已将53名街头青年安排到9所不同的学校。但情况也有反复。被安置的青年中有3名女孩怀了孕,9名男孩辍学。政府认为街头青年的问题是个教育问题,因此安排他们上学,但青年人自己却有不同看法。大部分街头青年需要的是工作和或能帮助他们找到工作的培训。许多国家尝试了创收计划,如博茨瓦纳的男青年生产队,斯威士兰的工作营地,以及赞比亚的家庭发展服务。这些计划都是成年人按自己的心思揣摩青年人的需求而设计出

来的。可是大多数街头青年认为这些计划与己无关,因而对之不理不睬。而这些计划实行起来相当昂贵。

最后一种政策途径是推广人道且实际的行为,如向街头青年提供食物和住处。这是一些非政府组织如SOS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专利。SOS提供小型的家庭式住房,每所住房住10个至12个孩子,由一位成人照顾。孩子们住在这里能够接受教育,并有医疗保健和娱乐设施。博茨瓦纳、纳米比亚和南非都有这样的中心。但这些地方却没有大部分街头孩子所渴求的自由,而且这些设施非常昂贵,只能容纳一小部分孩子。威廉姆斯(Williams,1996)还指出,非洲许多儿童机构时有虐待儿童的事件发生,而且人满为患,工作人员短缺,工资过低。

## 结 论

南部非洲的街头青年必定会越来越多,因为最初引发这一现象的各种因素有增无已,尤其是经济危机将持续下去,贫困人口会越来越多。严重影响这一地区的艾滋病也势头不减。尽管当局和公众不给街头青年好脸色,街头青年却不会自行消失,也不容忽视。目前解决这一问题的各种努力尚未取得协调,我们需要一套整体方案,需要社会各部门通力协作。在南部非洲进行的研究表明,我们需要更深入地了解街头青年的家庭情况,研究乡村向城市的流动对这一现象的影响,还需要了解街头青年之间的差别。这些调查研究有助于精确调整针对街头青年的政策和计划。

黄 觉译

## References (参考文献)

- ANNEW, J. 1996. 'Difficult Circumstances: Some Reflections on Street Children in Africa', *Africa Insight* 26(3), 203-210.
- APTEKER, L. 1994. 'Street Children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A Review of their Condition', *Cross-Cultural Research* 28(3), 195-224.
- APTEKER, L. AND ABEBE, B. 1997. 'Conflict in the Neighbourhood: Street and Working Children in the Public Space', *Childhood* 4(4), 477-490.
- BAR-ON, A. 1997. 'Criminalising Survival: Images and Realities of Street Children', *Journal of Social Policy* 26(1), 63-78.
- CAMPBELL, E. AND NTSABANE, T. 1997. 'Street Children in Botswana', *Social Development Issues* 19(2/3), 39-53.
- COCKBURN, A. 1991. 'Street Children: An Overview of the Extent, Causes, Characteristics and Dynamics of the Problem', *The Child Care Worker* 9(1), 12-13.
- DONALD, D. AND SWART-KRUGER, J. 1994. 'The South African Street Child: Developmental Implications', *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24(4), 169-174.
- DUBE, L. 1997. 'AIDS Risk Patterns and Knowledge of the Disease Among Street Children in Harare, Zimbabwe', *Journal of Social Development in Africa* 12(2), 61-74.
- DUBE, L. KAMVURA, L. AND BOURDILLON, M. 1996. 'Working Street Boys in Harare', *Africa Insight* 26(3), 260-267.
-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NAMIBIA 1998. *The Namibia Labour Force Survey 1997: Interim Results*. Windhoek: Ministry of Labour.
- HURRELMAN, K. 1989. 'Youth: A Productive Phase in Human Life', *Education* 39, 1-10.
- LE ROUX, J. AND SMITH, C. 1998a. 'Caus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treet Child Phenomenon: A Global Perspective', *Adolescence* 131, 683-689.
- LE ROUX, J. AND SMITH, C. 1998b. 'Is the Street Child Phenomenon Synonymous with Deviant Behaviour', *Adolescence* 33(132), 915-926.
- LE ROUX, J. AND SMITH, C. 1998c. 'Public Perceptions of, and Reactions to Street Children', *Adolescence* 33(132), 901-913.
- MAPHALALA, T. 1996. 'Street Children in Swaziland', *Africa Insight* 26(3), 282-287.
- MUCHINI, B. AND NYANDIYA-BUNDY, S. 1991. *Struggling to survive: A Study of Street Children in Zimbabwe*. Report to UNICEF. Harare.
- PHIRI, J. 1996. 'The Plight of Street Children in Zambia', *Africa Insight* 26(3), 276-281.
- ROSE-JUNIUS, S. 1993. 'A Study in Four Urban Centres in Namibia to Determine the Cyclic Nature of Streetism'. PhD, University of South Africa.
- ROSS, C. 1991. 'The Street Children: Survival Strategies', *Indicator South Africa* 8(4), 69-72.
- SWART-KRUGER, J. AND RICHTER, L. 1996. 'South African Street Children: At Risk for AIDS', *Africa Insight* 26(3), 237-243.
- TACON, P. 1991. *Survey on Street Children in Three Urban Centres of Namibia*. Windhoek: UNICEF.
- TACON, P. AND LUNGWANGWA, G. 1991. *Reap a Hundred Harvests: A Study of Street Children in Three Urban Centres of Zambia*. Report to UNICEF and Government of Zambia Lusaka.
- UNAIDS. 1998. 'UNAIDS Executive Director warns of Unprecedented Emergency in Southern Africa'. Press Release Johannesburg 30th November 1998.
- UNESCO. 1998. *1998 World Education Report*. Paris: UNESCO.
- WILLIAMS, C. 1996. 'Street Children and Abuse of Power', *Africa Insight* 26(3), 221-230.

到削弱。

(汪 珊译)

青年、过渡以及确定性的消失

卡米洛·苏亚雷斯

近年来人们常说:我们正在经历着一段过渡时期,老皇历要让位给“过渡时代”。“过渡”二字可以用来文饰现今只对少数人有利的社会混乱和不平等,可以搪塞青年的批评,谢绝青年的期望,还可以要挟大家为一个由乱而治、天下太平的时代而勒紧裤带。

这样的线性发展观是理解不了事物的过程、差异和个性的。它对任何有违“全球化”、“清一色”的异类都要否定。它不承认“青年”原是人生中实实在在的一个时期,只把它看做从幼年向成年的过渡。本文认为:今天我们应当把“青年时期”看成是一个“以政治、经济、文化之互相渗透作为其背景的”过渡过程。作者还讨论了当代青年运动的地位、前景以及面临的任务。

(黄为葳译)

过渡与青年文化:形式与表演

何塞·马乔多·佩斯

在一个变化着的社会里,年轻人向成年生活的过渡既是一种(生理变化过程中的)运动,也是一个(社会再生产的)过程。传统上,年轻人在这些过渡中服从于既定的形式,而今天向成年的转变则受表演文

化的引导。这些表演文化源于青年人日常生活中对常规星星点点的反动。

休闲是青年文化中最为突出的特点,因此我们认为年轻人的生活方式以新巴洛克风格审美化了,并存在一种视生活为探险的休闲伦理。但是,如果我们因为这些生活方式有共同的表现(休闲、强调视觉和劝导性),就将它们视为一种单一的现象,我们就可能被意义不确定的(特别依赖同音同形异义词的概念)表述所误导,因为实际上它们是不同的(不同的青年文化)。

(黄 觉译)

南部非洲的街头青年

彭佩拉尼·穆福恩

目前青年占南部非洲人口的大多数,而一部分青年终日游荡街头。结构调整计划、现代化、艾滋病等因素,都使这一部分青年人数增加。尽管街头青年是个多样的群体,但街上青年、街头流浪青年和被遗弃青年这样的分类,在南部非洲却没有多大意义,因为大多数孩子得工作,不同的群体也没有明显不同的生活方式。街头青年与更广泛的社会接触时,产生了一些问题,诸如公众对他们的不良印象、健康问题、走邪路及心理疾病症状,于是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本文探讨了针对街头青年的各种政策途径,认为整治街头青年现象需要走多部门综合治理的道路。

(黄 觉译)